

## 专题一 后发现代化国家 (或地区)的知识制度与知识生产

### 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 —— 关于全球化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对话

赵 刚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尼采

人力战而败，虽败，其争斗所求之物必将复临，然此物已殊异于彼等先前所执之义，后继者则必将另立新义而战，且以不同之名。

——William Morris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全球化论述<sup>①</sup>自 90 年代初开始在西方学界快速地攀升为主导性论述之一。没多久（大约在 1997 年左

右），台湾地区的知识界也流行起一股全球化风潮。这股风潮之所以出现，除了因为学术上一贯跟随西风之外，不可不谓是有重大的现实背景因素，例如，台湾地区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再结构中的位置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可能带来的各种经济层面上的影响的关切。台湾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应该如何地再结构以面临全球与区域新情势的挑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这种唯发展主义的问题意识（如《天下杂志》等刊物所体现的），似乎把其他一些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议题给挤压到幕后。就我有限的讯息，我知道至少在内地，类似的背景促使人们思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社会各层面的重大影响，重新讨论“政权”的性质、政权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平等或市场自由的相对重要性、社会保障的议题、以及民主社会的基础的问题。<sup>②</sup> 这些问题在理论与现实上的重要性使得相关讨论表现出一种论辩的尖锐性，而常常不无化约与扭曲地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新左”之间的辩论。比较起来，在台湾地区，这样的批判性讨论则几乎不存在。在 2000 年以前，类似的对“全球化”的批判讨论没有出现，似乎还不算是知识上的懈怠，因为客观的条件并没有对我们提出刺眼的警示（连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台湾地区都没有明显冲击）。但是，在 2000 年下半年以来开始的经济不景气、失业率的飙升、以及（承袭旧政权在 90 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政策）新政府在 2001 年 8 月“经发会”中更无保留地接受财团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殖民（表现在国家市场化（*marketization of the state*）与稍后开始的“政府改造工程”），都无比清晰地指出了上述那些内地知识分子关心，没有理由不也是此地知识分子关心。

本文即是历史地奠基在近几年来台湾地区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而寻求介入全球化这个流行论述，企图能批判出台湾地区社会唯发展主义之外的另类可能性。因此，反思全球化是立基于一个重要认定：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外在于台湾地区社会的“大趋势”，而

更是台湾地区社会的内在问题。这意味：对全球化的思考一定也是有关在地斗争的思考。从这个立场向前引伸出来的第二个基本立场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必然不能回避民族国家范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平等与民主问题。再向前引伸，本文的第一个基本立场则是：思考全球化即是思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从这三个基本立场出发，我认为在台湾如果要寻求反思全球化问题的具体切入点，那就必须介入（甚至有意挑起）有关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潜在）争议。而如果要有效地安置这些争议，我认为必须要有一够大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历史地、结构地厘清全球化论述与过程的核心问题点。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正文出现次数多的外文人名使用译名）1989年的经典著作以及广义的调节学派的启发，我认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所谓“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转变的讨论很适合本文的目的。<sup>③</sup>我的想法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霸权计划的核心是在解除国家与社会对市场的规约、瓦解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社会镶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解除正式劳动契约、鼓励弹性生产与实（存）时（间）管理（real-time management）、<sup>④</sup>挫败社会安全机制与平等机制，与对进步立法进行退缩修法，那么在台湾地区，这样的论述可能透过什么形式与议题进行？有什么样的反对论述？透过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两种对立政治立场的探讨，我们能提出些什么问题？

很明显地，我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置放在阶级这个特定的但也较普遍性与渗透性的争斗地带。诚然，这个争斗地带只是众多潜在争斗地带之一，其他例如媒体、环境、城乡空间、教育、医疗、农业、社区、与各种认同……，也都是很重要的争斗地带。我虽然认为它们和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密切关连的，但却没有去按照它们的重要性公正地处理它们，这当然是受限于作者的能力以及写作的篇幅，但也是因为早有人在不同的议题上分头进行（例如，冯建

三在媒体反全球化上的长期努力，以及台大城乡所在反全球化士绅空间上所进行的实践以及反思论述）。现在这篇论文虽是以阶级为主要的指涉对象，仅仅偶而涉及其他地带，但最终的目的则是希望能对所有这些争斗地带的反抗运动提供一些理论、政治、与伦理上的反思与对话。我相信，选择阶级作为切入点与指涉对象比较能够拉出一般性层次较高的反省，能将其他地带包容进来。

## 一、福特主义 VS. 后福特主义： 从两本社会学著作找出反思全 球化的经验切入点并进行提问

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台湾地区社会学界曾兴起了一阵关于小商品生产研究的风潮，<sup>⑤</sup>但由于各种可能原因（例如，学院分工与大环境对此类“政治经济学”议题的无感），迄今，这类研究一直还只在特定的社会学专业领域（例如，劳动体制、生产组织、劳动过程、中小企业、非正式经济）中被阅读引述，并未曾被置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上（即，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展开更高层次的、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对话。这一年多来，整个客观情势的改变使我们有了一个绝佳机会，跳脱当时的阅读语境与学门畛域，再度阅读这类研究；希望借由指出这类研究的后设立场与规范性定向的差异，重新厘定从未浮出，但理应存在的争议。在下面的讨论，我将处理两本分别由谢国雄和柯志明所著的此类研究，希望借由二者的对照比较，或许能帮助我们厘清在台湾地区该如何切入全球化这个议题，以及可以如何提问。<sup>⑥</sup>虽然两者的外显问题意识并没有直接扣连在当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制的讨论，但两者确实在关于台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现状的分析上采取了针锋相对（虽然没有被书写出来）的规范立场。简单地但也是正确地说，谢国雄的研究批判了后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柯志明的研究则（后设地）拥护后福

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对本文的分析目的而言，这两个研究帮助我们，在把全球化问题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看待的前提下，对全球化问题提出有在地关联的提问。

谢国雄在他对台湾地区的劳动体制的研究中，区分了两个概念——纯劳动（意识）与纯劳动力（意识），并以这两个概念作为基础，分析了台湾地区小商品生产里头的劳动主力——计件工——的劳动过程、薪资策略、以及主体意识。<sup>⑦</sup>谢国雄所谓的纯劳动，其实指的就是计件工那种“有做有钱，没做没钱”的劳动生涯。被纯劳动意识附身的劳工就不会想到要求底薪、加班费、假日工资以及其他工作成果本身之外的给付，同时也不会视随召随做的弹性工时为不正当的安排，至于没工作回家吃老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谢国雄指出这是一个极度商品化的劳动体制，连劳工都“以极度商品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劳动力。”<sup>⑧</sup>和这样一种劳动体制对立的体制则是以“劳动力”为基础构造：劳工是在一个“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下工作，并被正式或非正式的劳动契约所保障，拥有各种因为劳资协商而来的福利与保障。<sup>⑨</sup>劳工在这样的生产体制下所具有的意识称之为“劳动力意识”：“一旦劳动力卖给雇主之后，用不用是雇主的事，因此即使没有工作也有钱……”。<sup>⑩</sup>

谢国雄的研究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规范性与政策性的观点，即是对“台湾地区这种放任主义如此强势的市场专制体制”的内在质疑，<sup>⑪</sup>从而呼吁社会安全制度的保障，<sup>⑫</sup>后者以国家手段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幅度与强度。因此，对谢国雄而言，国家应该扮演除商品化的角色：建立基本工资保障，支持劳工争取合理的底薪、资遣费、失业救助、以及退休福利。谢国雄在他对劳资争议的研究中也发现“政权的失职”，将劳资争议的过程（例如赔偿金的决定）完全交给“市场化的机制”以及背后的“专制劳动体制”。<sup>⑬</sup>很清楚地，谢国雄对台湾地区的非正式劳动体制的弹性生产、外包、计制、薪资制度以及衍生的“虚假的”自由意识是采非常批判的立

场，他希望透过他的研究找到能够落实劳动法规的文化基础，以及建立一个有政权（即，法律）作为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sup>⑭</sup>不容讳言，谢国雄在后设规范基础上是高度肯定战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所发展出来的以社会性劳工运动为代价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论文第十节最后有关政权、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部分继续讨论。

柯志明环绕在台北松山五分埔成衣制造业的小商品生产研究，则形成了一个和谢国雄旨趣迥异的鲜明对照。尽管他们两位的研究对象类似：没有工会的生产体制、劳资之间没有长期固定的劳动契约、没有劳动条件的监督、工时弹性、采按件计酬制，<sup>⑮</sup>但他们的意识问题则截然不同。谢国雄关心的是劳动者被剥削以及自我剥削的劳动过程与文化基础，以及如何超越这种剥削状态，进而能使台湾地区的劳动体制借由制度化的集体协商达到更合乎正义原则的境地。但柯志明的意识问题则是：这种看似落后的、属于地下经济一环的小商品生产是如何地能够在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形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创造积累奇迹。<sup>⑯</sup>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柯志明尝试申论，台湾地区有像五分埔这样的仰赖计件制代工的生产组织：

并不代表其生产方式演化程度的时代落后性（*anachronism*）。相反的，产业本身相应于市场结构及性质的变化、劳力供给的条件、以及与大社会经济情境间的互动，而不断尝试去调适，透过外包纳入厂内雇工以外的劳动组织（代工）以动员新的劳力来源，及机变化（*casualize*）劳力（使劳动雇佣关系可以随机而变的意思）增加生产弹性。<sup>⑰</sup>

为了要说明台湾地区的弹性生产体制并非资本主义历史之残余，而是一种崭新的劳动力动员体制，柯志明将五分埔和英国原始

积累经验对照，指出英国是从发包制转变为厂内生产，五分埔则是舍弃了“僵化的”厂内生产而取发包制。<sup>⑩</sup>从积累的实用主义角度来说，当然“五分埔经验”说明了资本主义并没有唯一的演化道路，但是柯志明在使用历史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英国在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也同时出现了工会、工人运动、以及有关工厂检查、公共卫生、关于工时、薪资等劳动基准的进步立法。因此，柯志明的研究是从资本拥有者的立场形塑问题意识（一如书名所示），在肯定弹性生产与企业家私人创发力（*initiatives*）的同时，间接地将民族国家规约角色边缘化，并暗示其落后时代。

如果把谢国雄和柯志明的潜在对立放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的是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两种政治立场的对立。福特主义是由葛兰西（A. Gramsci）在二次大战前所发展出的概念，为的是能够掌握第一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最新发展。葛兰西发现一种由国家所介入的“计划型经济”已经取代了过去那种竞争型资本主义，因为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之间需要全面的官僚体系的计划与规范才能达到一种平衡，而这个工作在那种从经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角色里是不可能达成的。因此，福特主义并不等于泰勒主义，仅仅是生产机械化与劳动过程合理化的引进，而是全面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革：资本主义经由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达到的大量生产必须有整个社会与文化的配套（例如大公司、大工会、大国家、大众媒体、大众文化）。福特主义不是单纯的生产或经济的概念，而是一种积累体制。<sup>⑪</sup>这个积累体制在二战后从美国传布到西欧国家，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在哈维称之为福特主义高峰期（*high fordism*）的战后 1945 到 1973 年间，劳工运动的激进侧翼被肃清，劳工被整编到理性化的生产组织中，但与此同时，劳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国家提供社会安全、住屋、健康与教育保障。与福利国家同步出现的则是凯因斯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国家对薪资关系的控制。<sup>⑫</sup>当然，西方战后

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来不是由单一劳动力市场所构成，而一直是 James O'Connor 所说的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并存的局面，<sup>②</sup>后者是由种族、族群、与/或性别弱勢的边缘劳动人口所构成，是福特主义表面的包容政治下的排除政治。摆在台湾地区脉络下，谢国雄的研究的规范性定向即是企图找出那些被排除于垄断部门的边缘劳工，使之重新被包容到进步的社会政策体制中（在台湾地区，垄断部门当然指的是国营企业及少数的私人大型企业）。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萎缩结束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及其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大资本、大劳工、与大政府转而成为了资本积累的障碍，从此开始，“僵化”（rigidity）成为了指出黄金时期一切问题的缩写，而“弹性”则成为魔术字眼。哈维以及调节学派的学者都指出 1973 年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弹性积累体制（regim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弹性指涉的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与消费模式所有这些面向。资本开始重新结构、提高理性化程度、强化对劳工的控制、加速空间游走开辟新市场、试图借由新一波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来创造剩余。这个弹性积累体制严重地向资方倾斜，组织化劳工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结构性”失业、技术的快速折旧、实质薪资的停滞甚或降低、工会权力的弱化、以及规律性就业的大量减少，同时，零工、外包工则大量增加，而后者都逸出了工会、劳动契约以及国家法律的保障范围；50 年代以来劳工所拥有的社会权面临大幅缩水。这个体制从而鼓励了小型企业的形成，使之成为生产体系的主干。父权制的、准家庭的小规模生产（petty capitalist production）再度抬头，引发的效应则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被从根破坏，而劳资冲突的社会性质也被转化为小团体之间的争议解决。这种小团体生产因为要时时寻找专门的、小规模的市场利基，因此就带来了生产流通速度的加快、产品半衰期的剧烈缩短、以及市场的断碎化。这连带地刺激出消费主义的高涨，以新的、零碎、繁复的欲望、需求创造



出新的多元的商品空间，在此，以满足各种讯息、娱乐、意象模拟、认同欲望的所谓“服务业”部门快速膨胀。<sup>②</sup>哈维在其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一书中，就指出所谓后现代文化现象事实上是和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或弹性积累体制）有密切关系的。但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指出，弹性积累体制是新自由主义运动尝试瓦解战后直到 70 年代初期，由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所建立的社会安全体系，目的是加强资本的空间流动、降低生产成本、摧毁传统劳工阶级组织的新一波资本积累体制。

柯志明的研究虽然只是个案研究，并未深入涉及社会理论关于积累体制的讨论，但就规范性定向而言，清楚无误地是坐落在谢国雄研究的另一端，后设地肯定了弹性积累体制或是 O' Connor 所称的“竞争部门”：弹性工时、计件或计时薪资制度、无劳动契约、无社会安全保障、无工会、甚至无劳保。<sup>③</sup>

在台湾地区经济景气的前十年里，这两本书所隐含的对话及其意涵缺乏被读者（甚至作者）理解的现实条件，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近几年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学术上的激烈争辩的话题以来、在 2000 年下半年开始的台湾地区经济萎缩、失业率飙高以来，以及特别是在 2001 年 8 月召开“经发会”后的今天重读这两本书，它们似乎已经预先描摩了台湾地区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面貌，也从而约略指出了在台湾地区，所谓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必然是在一个基础争斗地带中展现：政权逐步解除对资本与市场的规约、退出对于社会正当性的追求、中下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的社会保障的瓦解与社会薪资的缩减、这些广大劳动者面临激进的劳动体制的重组并成为弹性生产与零碎雇佣的对象、社会性与集体性机构（例如工会、社运）被打压。这个两种关于社会结构前景的争斗，大致上是沿着柯志明和谢国雄非预期地描绘出的路径进行。

新世纪的开始，台湾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似乎已经决然地走上了“柯志明路径”：一方面，政权放弃了它对资本的规约职责，成为了

资本主义空间开拓的助手（例如 1986 年后政权产业政策在石化业上的表现），另一方面，资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将全面解除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民党政权主要经由劳基法所初步建立的劳资关系的规范，其中不乏相对进步之物（例如，对劳动时间的规范、基本薪资的规定、女性保护条款等）。乍看之下，似乎“柯志明路径”是一个左翼分明应该批判的对象，但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左翼对于“全球化”“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论述所纠葛缠绕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例如民族国家的角色、弹性生产、新科技典范、反抗主体、认同政治，等），似乎也莫衷一是。下面，我将讨论几种左翼关于全球化的说法，指出不管在台湾地区还是在西方，左翼面对全球化是充满矛盾的认知、心情与立场，并借由这个讨论拉出一些可以深入的提问。<sup>④</sup>

例如，在有关民族国家的角色这个全球化争议的核心问题上，持激进民主立场的巴柏（Benjamin Barber）就表现了一种两难态度。一方面，他认为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市民社会应该要捍卫，因为民族国家相较于分离性的、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部族主义（tribalism）仍是一个相对进步的社会整合与人权保卫机制，展望未来还可以此作为超民族国家的邦联（confederation）以及全球公共领域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全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日趋枯竭的今日，一种全球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势必得出现。在这个所谓的马尔萨斯的挑战下，“民族国家的寿命指日可数了”。<sup>⑤</sup>同时，巴柏也指出，今天的国家机器想要对四处流窜的货币市场与互联网进行规范是徒劳的，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国家的社会再分配角色，但按照他的理论逻辑，这个角色也应该是“指日可数”了。<sup>⑥</sup>巴柏充分理解到在新自由主义市场霸权下，国家退位，劳工面临全球范围垄断资本的剥削甚于 19 世纪，因此更需要团结，但这“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不可能”。<sup>⑦</sup>

如果巴柏的书写反映了一种左翼对民族国家在维持社会正义的

角色上有暧昧两难之处，以及对于反抗这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体的下落的茫然，政治光谱上更左的 Hardt and Negri 则是以一种类似目的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把民族国家给解释出局，且推出了“群众”（multitude）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Hardt and Negri 指出现今的世界正在朝向一种他们所谓的“帝国”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和过去的国际（international）架构之间有一种典范性差异，而核心就在于民族国家的逐渐淡出。<sup>②</sup>这个帝国体系是一个由两极所构成的体系：帝国与群众——之间没有任何介面。<sup>③</sup>Hardt and Negri 用“帝国”来描述新兴的全球权力体系是因为，和新自由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全球化并非立足于自由市场，反而是扩散四极的对作为生产手段核心的劳动力的去中心化的规约，特别表现在各种对劳动身体的放行与留置。所谓“群众”（multitude）即是被市场所牵引推拉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生产者身体之流（productive flow of bodies），将因市场而形成一个单一革命主体，进而要求全球尺度的公民权（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核心——其实也就是自由移民权）以及社会薪资权。<sup>④</sup>关于移民权，这的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述中的一个罩门，因为它宣传所有事物的自由流动——除了人体。但把移民权的斗争摆在新时期群众对帝国斗争的核心，是否忽略了造成大规模移民的动力是来自哈维所说的“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呢？Hardt and Negri 回避对资本主义的经验与历史分析的结果，是否会造成对于下阶层人民的欲望及其解放潜力的过度高估呢？<sup>⑤</sup>关于社会薪资权，到目前为止，它的最有力保护者一直是民族国家，但 Hardt and Negri 这两位左翼思考者似乎反倒是自废目前仅有的武器，却在所谓全球的尺度上谈论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格局的“革命”。尽管如此，另一方面，Hardt and Negri 也的确试图在极端差异政治的流行中重新厘定“普世性”的议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反帝国的全球主体。

对照于 Hardt and Negri 在文化理论与哲学层次上对全球化的理论操作，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则直接地面对新形势的经济、组

织、与科技构成。他把资讯科技与网络看作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带来以全球为范围的新典范性网络空间的出现；这个新典范具有不可逆转性，将把资本主义社会带到一个新的纪元，谓之资讯时代。网络具有去中心化的集中能力，一方面将全球的各种资源与能量作立即的、跨越时空与社会机构（例如政权）限制的统整，造就了节点与网络通道守门位置的无比优势，但也同时排除了广大人群，形成了空间与社会上的二元极化，而由于资讯科技的核心性，这个不平等结构又基本上是以“数位鸿沟”显现。这些被排除者，对柯司特而言，似乎仅仅剩下“自我”或是“认同”的力量，只能留驻在地方（或乡梓）空间（space of places）上徘徊。因此，柯司特将“网络”与“自我”对立，其实并没有超越全球主义与部族主义的对立说法，指出这两者处在一种永恒的互斥状态下，互不搭理。<sup>③</sup>在柯司特的理论架构下，反全球化似乎只有认同政治一途，后者在地方空间与钟表时间的后设基础上消极地抵御（而似非反抗）由资本、网络、市场等构成的流动空间的穿透。柯司特引用 Alain Touraine 的说法来支持他的认同政治核心论：“在后工业社会中，（……）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了阶级斗争的观念。”<sup>④</sup>虽然如此，柯司特对于反抗的可能勿宁是悲观的，因为他的未来主义气息浓厚的有关资讯时代的宣言似乎已经使得反抗成为徒劳，只剩相濡以沫。柯司特一边指出，那些被网络排除或“关闭”（switch off 的广大人民、地域、与活动并没有消失，但另一边宣告“他们的结构性意义（structural meaning）消失了”……。柯司特因而甚至比 Touraine 还更向前一步，实质地宣告了主体与历史的消亡——在网络逻辑中还可以找到任何的主体性吗？还有历史吗？还有社会吗？柯司特似乎征候性地反映了科技决定论左派的一种精神分裂，过度着迷于说服自己与他人有关一个全新的、排山倒海的巨变，但却还试图在已然被自己的启示录话语所掏空的基础上进行“反抗”。出于不同原因，柯司特似乎与 Anthony Giddens 一样，

都“超越”了或模糊了政治上的左和右的区分。

在台湾地区，批判学术界里直接关于全球化这个议题的重要研究者包括了夏铸九与瞿宛文。瞿宛文的写作比较集中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经济单位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角色问题，我将在第十节里讨论。这里将先讨论夏铸九的相关写作，是因为它们牵涉的议题与面向较多，比较能帮我们将全球化进一步问题化。夏铸九基本上同意柯司特的科技决定论，指出新的“资讯技术范型”是全球化的演化动力，并指出“1990年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资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已经全球化了的台湾地区”（作为一个论述前提）是夏铸九所认为的台湾地区能够免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像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台湾地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置放在泛太平洋圈从加州矽谷、台北新竹到大陆沿海的全球巨型城市的网络之中，<sup>⑤</sup>且已经成功地达成资讯科技产业的产业升级。<sup>⑥</sup>夏铸九不同意瞿宛文对台湾地区能自亚洲经济危机脱身的原因是在于政府财经技术官僚体系的谨慎干预的说法，理由是“发展性国家（或地区）”在台湾已经耗尽其能量，根本无法面对全球化的变局，只能是“束缚政策能力的历史成见”。<sup>⑦</sup>夏铸九简洁地指出：“是网络弹性抵抗了危机”。<sup>⑧</sup>夏铸九虽然强烈质疑发展性国家（或地区）的当代有效性，但似乎并不妨碍他对发展主义的支持。虽然夏铸九说“历史与社会里从来就没有宿命论者发言的空间”，<sup>⑨</sup>但他却以一种不乏宿命论的口气，指出台湾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前途“已如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努力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加强研发所需的创新能力，力争上游”。这个没有发展性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主义对台湾地区的历史定位是“全球网络的节点”与“虚拟的桥梁”。<sup>⑩</sup>

但夏铸九也指出，这个以“资讯技术范型”为发动机的全球化，有其“创造性破坏”的一面，而吾人应尝试转换这种“现代性的鲁莽与粗暴”，<sup>⑪</sup>由野人文。但谁是进行这种工作的主体呢？实验

的形式又是什么呢？夏铸九和柯司特相同，强调以地方（或乡梓）空间为基础的认同政治（例如古迹保存与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性，因为似乎唯有那种具有历史重量与空间定着的乡梓社区才能抵抗全球化所带来的极度不确定性。<sup>④</sup>但是如何保障这样的认同政治能免于滑向保守或反动的认同政治呢？跟随柯司特，夏铸九在概念层次上提出“计划性认同”替代“抵抗性认同”。<sup>⑤</sup>但是问题是，在夏铸九的柯司特式的对全球新情势的结构定位之下，既是不可不发展主义地“拼命向前”，那又如何能提出真正的、另类的、以“全面改造社会结构”为目标的“计划性认同”呢？也许感受到这个两难，夏铸九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全球经济的穿透的压力下”，反抗与出路的寻找也只能是“顺势而为”。<sup>⑥</sup>“顺势而为”本身无可厚非，它甚至可说是广义的批判现代性（包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承袭智慧，指出新社会是在旧社会已经发展出来的某些进步基础上浮现的；对旧社会，吾人应有一种“弃取”（*aufhebung*）的态度。这个态度和各种传统主义或是反动的现代主义（例如科技主义极右派）在历史观上是有很不同的。因此，“顺势而为”的关键意义不在于笼统的“顺势”，而在于了然于何所弃、何所取。好比说，民族国家就算是一个该弃的形式，但似乎也不该导致说民族国家的所有历史内容皆无可取。这于是牵涉到全球化之下，关于“福利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政权的社会职能的问题。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在 1995 年《台社》第 20 期的集体情势定义论文就在界定当时最大的危机为民粹威权主义的主调之下，展现了对于行政力量的强力批判，包括对领袖型民主的批判、对行政力量发展经济不力的批判、对国族身份政治的批判、以及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就我现在的关心而言，这篇立场宣示性论文的一个问题也许就在于对国家机器的矛盾期待，一方面寄望行政力量扮演经济成长的规划角色，但另一方面对它所能扮演的分配角色却展现了极大的不信任；对台湾地区的新兴福利体制并没有介入的立

与企图，而是借“西方经验”与傅科式的措辞将福利国家命定论地定位为失败经验：“必然造成财政赤字”、“造成行政力量权力的更加膨胀集中”、“抑制了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官僚横行与无能”、“取得矫正、惩罚‘边缘者’的训育权力”。<sup>⑤</sup>除了最后一条，这些说法似乎和柴契尔主义不谋而合。在 2001 年的今天，这些说法也似乎是国家市场化（例如反对全民健保）的人们所经常援用的修辞。事后诸葛地看，台湾地区的左翼似乎太过着力于对民粹威权政权的批判，而严重轻忽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作者本人就有同样问题）；似乎一方面对发展主义缺乏足够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过早地抛弃了介入国家机器功能改造的可能视野。

夏铸九在较早的写作里，也曾直接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批评，而批评的语言和新自由主义或是“第三条路”论述对社会民主派（欧）与自由派（美）的批判语言有汇流的倾向，都将官僚体系视为一种自我生产与扩张的异形，只会“由社会取走财富”，同时，官僚体系的改革都是朝向“效率更低落”；官僚体制的替代之路即是“社区参与”。<sup>⑥</sup>夏铸九在他对未来的想像中，对民族国家的未来角色也采笼统式微说，指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将被超民族政权与地域政权这两道新兴力量所“空洞化”。<sup>⑦</sup>他对全球化之下的行政力量角色也采后福特主义观点，强调政权的角色是配合新一波资本主义生产的“弹性分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集中其作用在“劳动力转业、再就业、再教育等，以保持劳动力市场之弹性”。<sup>⑧</sup>在民族国家或中央国家空洞化的同时，夏铸九召唤市民主义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进行补空，“促使中央政府向地方开放”。<sup>⑨</sup>要言之，在夏铸九近几年来对全球化不乏两难困局的论述中，比较明确的是民族国家这个行动尺度的放弃、对社会极化（polarization）缺乏理论介入的语言、以及赋予（社区）认同运动在反对运动中的核心位置。本文将和这些说法与倾向进行对话。

回到经验现实。我们看到晚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世界各地

强化了社会市场化与政权市场化趋势，造成了各种社会机构的文化与社会镶嵌的剥落，使中下阶级更加原子化地暴露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带来了社会普遍滋生（而尤以中下阶级首攫其锋）的巨大的不安全感、疏离感、与流离感。但这些挫折的感觉并没有办法和一种历史的、结构的分析语言勾连起来，因此经常迅速地和各种广泛的社群主义或民粹主义短路接线，后者提供一种确定感使人们得以在感觉的层面上和“全球化”这个巨大的、无人味的（*impersonal*）、遥远的力量抗衡。法国的民族阵线、美国的基督徒联合（*Christian Coalition*）、日本的小林善纪现象、台湾地区的极端化拥／反小林的各种力量，其实都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对国际劳工流动、文化美国化、或“传统”失落的直接反动。参与到这类运动的基层民众经常是一般市民以及其他社会中下阶级的人士。这些人有正当的苦闷与压抑，但这样的运动是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有效的反抗吗？如果我们质疑这种反抗方式，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纯粹政治信念上的对立吗？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一条反抗之路，那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该呼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伦理呢？如果说，一种纯粹的在地的、乡梓的反抗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跳到这个微观尺度的另一极——全球尺度呢？左翼有国际主义的传统，我们如今是否还该坚持？对这个国际主义，我们是否应有新的理解，该强调哪些目标，要达到这些目标，该在哪些场域或是尺度上行动呢？

台湾地区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感觉结构”的后头是一种社群主义的诱惑，要召唤出“家”和“自己人”的认同，这个认同有其正面意义，对乡土的关切可以转换为市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进而对资本主义／威权政权的操作能有所制约。但近十年来，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讨论并没有被深化，深化的反而是“族敌对性”。“大陆”被建构为一个唯一他者、被负面地用来强化这个社群主义诱惑，但同时也被用来压制、扭曲甚至替代台湾地区社会内部在全



球资本主义之下不得言说的不满与苦闷。因此，换个角度看，我们不得不质疑社群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真的像表面所示的那么对立吗？似乎是有更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去探索。台湾地区近年来所流行的“社区总体营造”、“志工运动”、“寻根运动”、“村史镇志运动”、“社区大学运动”……这些现象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运动是否是反抗全球化的有效手段？又，全球化是否可以文化主义地以“西方文化的同质化运动”或“文化帝国主义”来想象？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是应该被再度置于分析的焦点？在全球化这个名词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到底和先前的资本主义有何不连续性？我认为也值得进行初步思考。

从以上的简单从而有可能化约地对文本与经验现实的讨论出发，我认为关于全球化这个议题，以下几个问题也许值得提出：

一、（民族）政权式微了吗？哪些方面式微了？哪些更强了？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民主与社会平等的影响为何？

三、左右的对立是否还应该被提出？

四、批判的社会运动可以如何看待和政权的关系？

五、全球主义（globalism）还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左翼该如何理解国际主义？

六、各式民粹主义或社区主义是出路吗？反抗全球化的施为（agency）应该落实在哪些空间社会尺度（scale）上？

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该呼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伦理？

八、返回问题的起始，全球化究竟该如何理解定位？是一个新瓶旧酒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计划呢？还是一个涵盖生产、流通、与消费领域的革命性的“质的转变”？

九、如何看待全球化之下台湾地区的发展主义？

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及知识分子行动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 1998 年出了一本书——*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提出了布迪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纲领性看法，